

第9典
宗教与民俗

第10典
中外文化交流

第11典
历史文化

第12典
沿革文化

第3典
民族文化制度文化

第4典
教化与礼仪学术

第5典
科学技术艺文

第6典
第7典
第8典

中华
文化
通志

第2典

【地域文化】

晋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乔志强
李书吉

等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2典
【地域文化】

晋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晋文化志

作者简介

乔志强,1928年生。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山西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山西省历史学会理事长、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著有(含合著、编著)《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史新编》、《山西通史》等18部。发表论文、译文50篇。

李书吉,1955年生。山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合著有《山西通史》等。发表论文10余篇。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力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讨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本书阐述了三晋地区(今山西省境域)自远古时代迄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三晋地区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是夏朝的统治中心,是夏文化的主要考古发掘地,其地下遗存极为丰富,考古价值极高,本书充分地反映了关于这一地区的考古研究成果。三晋地区又是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12个民族的交会之地,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民族文化的互相渗透对晋文化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书对此亦作了详细阐述。本书对三晋地区的姓氏郡望、石窟艺术、戏剧文物、盐池文化等一些富有特色的内容都作了充分反映。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地理面貌	41
第一节 地域形势	41
第二节 自然形势	49
第三节 文化地理	59
第二章 原始文化	71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文化	72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文化	91
第三章 民族融合	110
第一节 晋国的多民族构成.....	111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122
第三节 民族融合的文化成果.....	136
第四章 姓氏郡望.....	148
第一节 姓氏.....	148

第二节 郡望	177
第五章 学术思想	198
第一节 三晋思想文化的形成	198
第二节 “百家异说”时的三晋文化	207
第三节 汉唐时期的三晋思想文化	221
第四节 理学与三晋文化	232
第六章 石窟艺术	245
第一节 佛教和石窟寺	245
第二节 云冈石窟	253
第三节 天龙山石窟	271
第四节 中小型佛教石窟	277
第五节 道教与龙山石窟	280
第七章 文物名胜	284
第一节 上古遗迹	284
第二节 名山古刹	297
第三节 古代建筑瑰宝	310
第四节 戏剧文物	323
第八章 文学艺术	328
第一节 三晋文苑	328
第二节 三晋艺苑	348
第九章 盐池文化	375
第一节 运城盐池与河东文化	376

第二节	昔日辉煌的河东盐池.....	381
第三节	封建社会后期的盐池.....	392
第四节	明清运城盐池的各项文化建设事业.....	400
第五节	二十世纪死而复生的盐池.....	406
第十章 煤铁的开发与冶炼.....		416
第一节	晋煤的发现、采掘和利用	417
第二节	山西铁冶.....	425
第十一章 山西商人.....		437
第一节	古代晋商.....	437
第二节	步入全盛的山西商人.....	444
第三节	晋商启示录.....	458
第十二章 书院文化.....		467
第一节	宋辽金元的书院初创时期.....	467
第二节	书院的初步发展时期.....	469
第三节	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	472
第四节	书院的败亡与近代山西教育.....	481
参考文献.....		486
后 记.....		488

导 言

一、晋文化的发展脉络

山西在西周时称唐，春秋为晋（又名并州），战国为三晋（韩、赵、魏）。山西一名专指今山西省地区，始于东汉，以位于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又因为它处于黄河以东，所以也有河东之称。到隋杨广大业十一年（615年）封李渊为“山西东道抚慰大使”，山西东道在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山西之名，由此奠定，元代正式设置“河东山西道”，明有“山西行中书省”，简称山西省，其后相沿不改。

晋文化，泛指山西地区的文化，以历史发展顺序而论，它应当包括旧石器时代的汾河文化（包括西侯度、匼河、丁村文化等）；尧舜禹上古神话传说；夏墟考古及夏文化；两周考古及以区系界定的晋文化类型；战国以法家为特征的三晋文化；汉晋时期的河东文化；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文化和隋唐以后走向成熟的山西文化。综合各历史阶段的内容，在横向 上它包括：山西的人文地理环境；原始文化遗存；民族融合；学术教育；山西大家族；文学艺术；煤铁盐酒；石窟艺术；文物名胜；山西商人十个方面。由于上述诸类文化形态和各方面的文化内容尚在发掘、研究和探讨中，有些文化形态和文化内容之间限于地下考古发掘不够或文献材料佚缺以及研究上的不足，对于其内在的联系

和沟通还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一致的看法。因而准确把握晋文化的内涵，仍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叙述之前，先看看晋文化赖以生成的环境。

地质学上的新生代以来，山西的地理环境是：东部有海拔 1500 米以上的太行山脉，西部有以吕梁山为骨干的黄土高原和山地地形，南有中条山，北有恒山山脉。而中部又有五台山、云中山、太岳山耸立其间。在全省中部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裂谷，在这一裂谷中分布着一系列串珠状的盆地，由北向西南依次为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大致轮廓呈平行四边形，南北长 680 公里，东西宽 380 公里，纵跨北纬 $34^{\circ}16'$ — $40^{\circ}44'$ 六个纬度带，横跨 $110^{\circ}15'$ — $114^{\circ}32'$ 四个经度线。境内地形高低悬殊，东部为山区、中部平原区、西部高原区。山西又处黄河中游，远古以来，这里大部分地区水源充足、气候温和、林木繁盛、资源丰富，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地区。

山西为四山锁闭，境内分布的盆地又自成体系，构成一个相对的封闭系统，但中部的黄河水系（汾河、涑水河、亳清河、沁河）和海河水系（滹沱河、桑干河、漳河）又是从北部边疆通过我国中原腹地的天然“走廊”。前一特点造成晋文化生成有较强的地域特色，而后者又说明晋文化自古就是一个天然的开放系统。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山西自远古以来就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

（一）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的“汾河文化”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北起阳高，南至芮城，西自黄河左岸，东抵太行山麓的山西境内发现了旧石器不同时期的遗址和地点 225 处，数量居全国之冠。著名的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西侯度文化、匼河文化，中期的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晚期的峙峪文化、下川文化和薛关文化。

芮城县的西侯度是目前所知中国境内最古老的一处旧石器遗

址。这里出土了大批古脊椎动物化石，32件石制品及带有切割和刮削痕迹的鹿角，这是一处典型的石片石器文化遗址，它的发现说明，早在180万年前的远古时代，山西境内就有了人类的踪迹。匼河文化是在芮城发现的又一处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其16个点分布在以匼河为中心，北起独头北沟，南至涧口南沟，长达13.5公里的范围内，从而构成匼河遗址群。从匼河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石制品138件，工具分为五大类，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大量的是石片石器，其中用投击法生产的一种石片重五公斤，这是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大的一件石片。丁村遗址位于襄汾县汾水河左岸，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共发现遗址16处，获石制品2000余件，人牙化石3枚和1块顶骨化石以及大量动物化石。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比较，丁村人制作石器的技术和方法有了很大的进步，类型也较为稳定。砍砸器和厚尖状器是丁村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工具，其中厚尖状器类的三棱大尖状器和鹤嘴形尖状器被誉为“丁村尖状器”。这一石器文化类型在汾河流域的侯马、静乐、古交都有类似发现，被称为“丁村遗址群”。

丁村遗址一发现就以它鲜明的文化特征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裴文中指出：“无论在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文化，它是在黄河中下游汾河沿岸生活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文化。”^①又因其主要分布在汾河流域，所以有学者将它称为“汾河文化”。

1976年以后，山西省文物部门又对丁村遗址进行了连续数年的调查发掘，发现了分属旧石器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几处。

更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认为，丁村文化由匼河文化发展而来，

^① 裴文中：《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而匼河文化早于北京猿人文化,应居于旧石器初期的早一阶段。研究者进一步认为,就石片文化这一明显的特征而言,匼河文化同西侯度文化极为相似。由此说明,分布在山西南部的西侯度文化同山西西南部的匼河文化、丁村文化是一脉相承、自成体系、自行发展的一种文化形态。

丁村遗址同以后发现的陶寺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曲村—天马(晋国早期都城)、晋侯墓地、侯马晋都新田遗址都分布在汾河大转弯处,这一情况引起考古学界特别的重视。目前我们还没有将汾河文化同以后考古学上的晋文化联系沟通起来的直接依据,但我们也有理由作如是的推测。

(二) 尧舜禹上古神话传说

我国史籍中有关于炎、黄、尧、舜、禹的许多史前神话传说。这些见诸先秦及此后史籍中的神话故事是探索我国上古文明源头的一个重要线索。大量文献记载都有黄帝为华夏祖先的说法。黄帝究竟有没有?如果有,究竟在何处?这个问题又成了二十世纪后期的一个热门课题。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是个部落联盟。关于黄帝的地望,有陕西说、山西说,也有山东、湖南说等等。我们认为:首先黄帝作为一个部落联盟大致是可信的;其二,黄帝故迹遍布全国,这一方面说明黄帝作为华夏始祖由来已久,另一方面,黄帝作为一个部落联盟集团,还处在游牧部落阶段,就说明他们还没有定居或没有完全定居。所以《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在涿鹿之战后其活动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山西有关于黄帝的传说,传说中的黄帝在山西的活动范围大致在晋南和晋西南。《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关于“黄帝擒蚩尤”的记载,传说蚩尤为黄帝杀死后,它的血化为卤水,这就是解州盐池。传说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开启了文明的先河,在今临汾南有仓颉故

宅。黄帝后裔中最有声望的一支主要活动在山西。尧的活动据《竹书纪年》说：“封于唐，游居于陶。”前人关于陶唐的地望也有不同说法，归纳起来有三种，即山西临汾说、河北唐县说、湖北随县说，三地之争由来已久。我们仍可作这样的解释，尧居三处都是有可能的，黄帝以来，自尧开始定居，尧有三处都城亦不足为怪，只是湖北随县似远了一点，联系“尧都平阳”的明确记载和都平阳以后的史实，可以推断，平阳是尧定居以后的真正都城。唐朝于显庆年间在平阳大规模修建尧庙，应当是有相当的文献和传说根据的。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晋卿范宣子（士匄）曾对使晋的鲁大夫叔孙穆说：“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有类似的记载。据此我们推测，上古时代在我国北部有一个陶唐氏的部落，可能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个善于烧制陶器的部落，故以“陶”为名，陶古语为窑，同尧谐音，于是后世遂把作为族名的陶唐氏人格化为传说中的帝尧，或连称“帝尧陶唐氏”。^①

尧以后是舜、禹，史籍有尧都平阳“寝不安席，日思孝民，舜都蒲阪”，“渔雷泽、陶河滨”，禹都安邑“行山表木，导水利川”。今山西临汾有尧庙、尧陵，永济有舜庙，夏县有大禹故迹。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史记》司马迁对商的记载是可信的，那么对夏朝的记载也应当是可信的，再往前推，夏的建立者启之父也不应当是子虚乌有的。近年来考古界关于夏墟、唐国、晋国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已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材料。

（三）夏墟考古与夏文化探索

山西汾河下游和涑水流域，素有夏墟之称。二十世纪初、中期豫西、晋南、晋中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对探索夏墟和夏文化有了重大

^① 李孟存：《晋国史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版。